

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

——以元末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为例

饶龙隼

(上海大学 文学院, 上海 200444)

摘 要：东南文学生态之形成，在总体上有两大表征：一是元末明初南北文化被隔裂；二是东南文人呈地域群落分布。这不仅成为当时文坛格局的基本框架，而且影响着元明易代之际的文学走向。明初广开仕进之路，多方文士征聘入朝，实现了以群落归附明廷，因使庙堂文事次第展开。但君臣都没有想到，竟然在不数十年间，弄得各地域文学消歇，中央庙堂文学亦顿衰。由此可知，元末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，实成为当代文学的主体构造；而呈地域群落分布的东南文坛格局及其变动，又构成元明易代大转变时期文学活动的主线。这是一种罕见而特异的文学形态，与盛国时期的常规文学形态不同，其主导方面不在中央庙堂，而在政化不通的地方文苑。此一易代之际特有的现象，值得研治中国文学者重视。至于如何探研这种现象，则应有深切到位的策略：先要基于它的整体性，来对之作出整体把握；次应立足它的规定性，来对之进行动态描述；还须照应它的复杂性，来对之实施焦点透视。这样才可望在特定时空维度中，还原地域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。

关键词：元末明初；东南文坛格局；地域文学群落；层级构造

作者简介：饶龙隼(1965—)，男，文学博士，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及元明清文学研究。

基金项目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“明代作家专题研究”(项目编号：13A2D046)；上海高校中青年教师国外访学计划项目“明代作家去精英化研究”的阶段成果。

中图分类号：I209 **文献标识码：**A **文章编号：**1001-4403(2014)03-0132-09 **收稿日期：**2014-02-05

明初广开仕进之路，多方文士征聘入朝，实现了以群落归附明廷，因使庙堂文事次第展开。这包括：扭转文化重心偏居东南的局势，促进南北儒学教化之平衡发展；结束文学群落多元并存的格局，使读书人学有所用而野无遗贤；全面推行文治并尊崇程朱理学，以解除武力集团对皇权的威胁；完成朝章制作和充任文学侍御，因以修饰文治并开出皇明大雅。当洪武时期，此四项任务，都付诸实施，并初见成效。但君臣都没有想

到，竟然在不数十年间，弄得各地域文学消歇，中央庙堂文学亦顿衰。此一易代之际特有的现象，值得研治中国文学者重视。至于如何探研这种现象，则应有深切到位的策略。

一、元末东南各地文学群落之形成

元末东南文坛之格局，总体上有两大表征：一是南北文化被深度隔裂；二是文人呈地域群落分布。前者是元朝失驭、政化不通的后果；后者

是东南丧乱、群雄割据的产物。这两项是一体共生的：南北文化被撕裂会迫使东南文人如置化外，而东南文人远离政化又加剧南北文化之隔裂；呈地域群落分布会增强东南文人的地缘性，而东南文人地缘依赖更滋长对朝廷的疏离感。如此，东南文人呈地域群落之分布，就成为元末文坛的客观存在，不仅成为当时文学生态的主体构造，而且影响元明易代之际的文学走向。

至顺三年(1332)十一月，年幼的宁宗懿璘质班驾崩，宗亲重臣议立年仅十三的妥懽帖睦尔，而太史有言“不可立，立则天下乱”，以故议而未决，致使大权旁落。但迁延数月之后，权臣燕铁木儿死，妥懽帖睦尔终于得立，此即为末代皇帝惠宗。^{〔1〕}卷三十八而后惠宗朝之事，果应了太史谶语：至元三年(1337)正月癸卯日，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率众反叛，国号大金，改元赤符。^{〔2〕}卷三十九是为平民反朝廷，另立国号之先声。及至享国十余年之时，天下大势已岌岌可危；以至至正五年(1345)十月辛酉日，即便贪残成性的惠宗也不得不诏认：“和气未臻，灾眚时作，声教未洽，风俗未淳，吏弊未祛，民瘼滋甚。”^{〔1〕}卷四十一这实际上为国势颓危、末季骚扰展示了乱象。

先是反叛蜂起，天下大乱。到至正七年(1347)，天下形势已极为严峻。面对这般局势，十一月甲辰日，两淮运使宋文瓚上奏，向朝廷发出严重警告：“沿江盗起，剽掠无忌，有司莫能禁。东南五省租赋之地，恐非国家之有。”^{〔1〕}卷四十一这话绝非危言耸听，东南若非国家所有，不仅切断了元朝经济命脉，而且也阻断了南北文化交流。而《明史》馆臣的描述，更用“天下大乱”称之：“元政不纲，盗贼四起。刘福通奉韩山童假宋后起，徐寿辉僭帝号起蕲，李二、彭大、赵均用起徐，众各数万，并置将帅，杀吏，侵略郡县；而方国珍已先起海上；他盗拥兵据地，寇掠甚众。天下大乱。”^{〔2〕}卷一大乱的后果是，水陆交通阻断，饥馑疫病蔓延，甚至父子相食，灭绝伦常，人无种类。乃至洪武元年(1368)闰七月间，大将军徐达率师徇取河北诸州县，所见“道路皆榛塞，人烟断绝”^{〔3〕}卷三十三。盛明太平宰相杨士奇，也痛心疾首地回顾说：“元之季世，兵戈饥馑，民困穷冻馁无食，至相食以苟活，虽父子夫妇相视不能相保恤，所在皆然。”特别是江淮以北，沦落为文化荒漠。^{〔4〕}卷二，卷四

接着群雄割据，竞相称制。仅在东南一隅，就有多方政权：至正八年(1348)十一月间，台

州盐贩方国珍为仇家所逼，携兄弟聚众海上，以对抗官军搜捕，迄吴元年(1367)降附朱元璋前，据有温、台、庆元等处凡二十年。自至正十二年(1352)，平民陈友定应募击寇贼，及至正二十四年(1364)某月日，以功授福建行省平章，从此窃据闽中八郡之地，庶政皆由其一人来总制。至正十三年(1353)五月乙未日，泰州张士诚及弟张士德、张士信为乱，陷泰州、高邮等地，据以僭国号大周，自称诚王，建元天祐。至正十五年二月己未日，刘福通等自碭山迎立韩林儿为帝，号小明王，建都亳州，定国号宋，改元龙凤。至正十五年(1355)六月，朱元璋率众自和州渡长江；次年三月庚寅日，率兵攻取集庆路，改集庆路为应天府，设官府而四出征伐；至当年七月己卯日，以吴国公称制一方。至正十五年(1355)十二月，陈友谅诛杀异己赵普胜，乃以江州为都城，并奉徐寿辉居之，自称汉王，专决其政；及至正二十年(1360)闰五月，为便于僭称皇帝，又杀徐寿辉，尽夺其威权，定国号汉，改元大义。至正十五年间，东莞民何真集兵保乡里，以功累官荣禄大夫、江西福建行省右丞，迄洪武元年归降前，广东岭海之间一方平安赖之。^{〔3〕}卷一，卷四〔5〕各卷

对于上述反叛、割据之实况，史家称为“天下大乱极矣”^{〔3〕}卷二百五十七。但当蒙元失驭、教化不通之时，天下生民丧失所天、无由庇护；则在一定社会文化区域内，群雄拥兵自重、割据称制，亦为一方平安所赖，未尝不是一种补救。当时，张士诚窃据吴中，朱元璋坐拥南京，陈友谅盘踞武汉，陈友定保有八闽，方国珍攘夺温台，及何真镇守广东，都能保境安民，维持一方秩序。虽然在各方边境上，群雄之间征战频繁，但在割据范围之内，百姓犹可暂且偷安。所以，浙西士商纷纷流入吴中富庶之地，淮西士民竟敢随朱元璋渡江求生，宣徽士绅肯效力大明，浙东文人愿趋走南京，闽中居民能远离战火，岭海之间多乱世顺民。其他若江右文人，虽常受流寇骚扰，然因不处于四战之地，尚得以安守陵园田庐。甚至当中原混乱之时，以义兵起家的李思齐，也独能仗义施仁，率义旅保有关中。^{〔5〕}卷十〔6〕卷十八

且因有赖于割据政权的庇护，在相对独立而安宁的环境中，人民不仅得以生聚苏息，还能流连诗酒讲习书礼，使一方风雅不坠、弦歌不绝，创造出地方文化的短暂繁荣。这当然是衰世的繁荣，犹如最后的回光返照，虽说是蒙元国运没落

的哀悼,却也是新朝乘运龙兴的萌兆。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:

在人际交遇上,割据政权吸附着一批文人,似乎诸贤毕至、群英荟萃。他们因某种机缘结成多层圈属,大都以意气相投和才情相尚。不同圈属与割据政权的关系近密或疏远,便会表现出相应的人生态度和政治倾向。这些相应的态度倾向,通常凝定为特定心态。大略表现为:他们既依赖割据政权的庇护,又唯恐遭受乱世枭雄的残害;他们既期盼廓清寰宇结束战乱,又看不准大势所趋鹿死谁手;他们心怀畏惧而与伪政权合作,又不敢陷得太深以免不能自拔;他们期待明主来拯救苍生,又不知群雄中谁最为英明;他们明知世无英主而消极忧愤,又好幻想真龙出世而自欺欺人。所以能看到:杨维桢、高启表率吴中,与张士诚政权貌合神离,成日里诗酒交欢,以博得苟且偷安;李善长表率淮西,追随朱元璋渡江,以身家性命来趋驰鞍前马后,冒天下不韪而贪求共享富贵;陶安为保障乡民免遭杀戮,率士绅赴辕门迎附朱元璋,劝诱其神武不杀以顺天应人,并迁就其威逼而愿麾下效力;刘基严拒近旁方国珍的诱逼,而更愿接受朱元璋遣使延聘,偕同宋濂等浙东四贤奔赴南京,甘听“为天下屈先生”之哄骗;刘崧隐处穷乡僻县而表率江右,从不择求明主却忍待天下太平,宁可窜伏山林来躲避流寇,也不屈身事人以免招罪尤。这就形成多种典型心态,即吴中文人的苟安心态、淮西文人的趋附心态、宣微文人的迁就心态、浙东文人的择主心态、江右文人的隐待心态。此外,闽中文人之遁世无闻,岭南文人之荒避狂斐……均可见文人圈属不同,其所持心态便各有异;但共同心声只有一个,那就是企求平安自保——浅见者唯保一己一时,远识者愿保家国天下。

在文学活动上,文人依地齐开展雅集酬唱,显得声气应求、志趣投契。他们主要是凭借特定地缘关系,来专修一方风雅而不骛外求。各地文人之间因受战乱阻隔而交流不畅,便会凸显出特有的文学趣味和审美风尚。这些特有的趣味风尚,往往沉积为地域特性。大略表现为:对人的自然天性之热情讴歌,对社会风俗教化之浸润涵泳,对本地山水风物之钟情描绘,对此方艺文传统之倾心传扬,对末世战乱动荡之切肤痛恨,对当代时势运会之通灵感会。所以能看到:杨维桢笔下,吴中的风土人情写得凄婉柔媚;而宋濂笔

下,浙东的风俗世态尽显朴厚无华。被前代文人描画无遗的虎丘,在元末乱世仍别具风神气骨;而未经昔人触染的岭南山水风物,却络绎奔赴“南园五先生”笔端。盛平时易被忽视的西昌风物,遭流寇骚扰竟使人触目惊心;而所见断壁残垣、枯木逢春,反使有识之士预感文明发祥……这摇曳多姿、神态各异的文学状貌,极大地扩充了中国文学的固有内涵:既描绘了衰世末运下的风俗人情画卷,又揭示了兵燹离乱中的山水田园之美;不仅展示了元末文学的丰富多样性,而且促使各地域文学得到长足发展。

在风俗教化上,师徒以学承维系薪火相传,使得学脉绵延、不绝如缕。他们天然地依托当地社会族群,来实现世通婚姻及递相师友。各家学脉在自成一统的环境中讲习传承,便会涵泳出独诣的风格品貌和精神特质。这些独诣的品貌特质,类皆培植为学术传统。大略表现为:吴中才俊传扬乡邦的流风遗韵,宣微宿儒绍述古朴的新安儒学,宋濂师徒自命为程朱理学正宗,江右文士绪承着清江儒学裔脉,闽中诗人缅怀逝去的唐宋宗风,南园词客追寻岭海的梵音仙踪。所以能看到:吴中文人如杨维桢、高启辈,既与张士诚伪政权若即若离,又不愿投诚新兴的皇明政权,其所缅想的是故地风流文雅;宣微儒士如朱升、陶安之流,既已迎附并看好朱元璋政权,就不计人主雄猜与一己得失,而倾全力为之筹划开国规模;浙东儒宗如宋濂、刘基辈,欲择求乱世明君而不得其人,乃半推半就入南京临时政权,幻想用浙东正学来教导人主;江右文士如陈谟、刘崧师徒,教人以身体力行、仁孝纯厚,既不择地而居亦不择官而处,故永葆道德优势和政治后劲;闽中诗家如张以宁、蓝仁等,或供奉在翰林或栖隐于林下,均能师法盛唐诗歌清雅之调,遂开明初“闽中十子”先声;岭南雅士如“南园五先生”,皆学无所主而性情磊落狂斐,赖守将何真庇护而远离战火,故恒能纵情诗酒、结想烟霞。

基于上述三个层面的凝聚,东南各地文人就聚合成群,且各文人群因交流不畅而相对独立,因使东南文坛格局呈地域群落分布。其圈属及成员,简略论列如下:(一)吴中:清阊阁在无锡,由倪瓒发起主持,有少数相投契的吴中文人参与;玉山雅集在昆山,由顾仲瑛发起主持,吸引吴中大多数文人,并接引流寓吴中的外地文人,如江右之虞集,浙东之杨维桢、王冕、高明、王祿、

岭南之黄哲、西夏之昂吉起文等；耕渔轩山庄在吴县，由徐达佐发起主持，先后参加集会者有一百二十位左右，而生平可考者近五十人，其唱和成果结集为《金兰集》；北郭十子的具体成员并不能确指，其核心是与高启同居北郭的文人，大约有高启、杨基、张羽、徐贲、高逊志、唐肃、王行、王彝、张适、宋克、陈则、释道衍、杜寅、吕敏等，其中高启、杨基、张羽、徐贲入明后重新组合成吴中四杰；杨维禎集团的活动中心在松江，虽组织松散但成员较为稳定，主要有追摹杨维禎“铁崖体”的百余位文人，大抵分布在浙江、吴中、松江一带，而又串联于玉山雅集、耕渔轩山庄、北郭十子、松江来青堂等集会。（二）淮西：李善长文官集团，包括流寓淮西当地的儒士，如六安老儒某、郭公某（郭子兴之父）、吴广、李善长、胡惟庸、吕本、杨璟、潘进、汪文、单安仁、朱复，以及卷入相府的外地文士，如杨益、汪广洋等。（三）宣徽：陶安、朱升及其师友生徒，都有郑玉、李习、王恺、范常、陶安、朱升、詹同等。（四）浙东：浙东四先生及其师友生徒，包括四先生宋濂、刘基、叶琛、章溢，及其友徒许元、吴沉、王祎、胡翰、苏伯衡、戴良、童翼、张孟兼、方孝孺、王绅、刘刚、楼璉、宋璉、郑楷等。（五）江右：江西十才子，其核心有李叔正、周浚、旷逵、万石、辛敬、杨士弘、彭鏞、刘楚、王佑、刘永之或王沂共十人，其外围有南昌朱隐老、朱善父子、熊钊、胡俨师徒，临江金固、傅若金、萧克翁，抚州熊鼎，西昌之陈谟等。（六）闽中：闽中十才子之先声，都有张以宁、蓝仁、智兄弟、林弼等。（七）岭南：南园五先生，其核心有孙蕡、黄哲、王佐、李德，其外围有黄楚金、王希贡、黄希文、蔡养晦、赵安中、澄、讷兄弟、文三山、黄原善等。

二、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之消歇

如上所述，东南文人各自蛰居一方，遭元末乱世而身陷困境：他们和当地的前辈一样，仍饱受蒙元统治的压抑；且其压抑并未随政纲废弛而消解，反而因群雄割据被抛置王化之外。但亦有不甘沉沦、自拔流俗者，痛恨天下崩乱、人道败坏之极，亲见黎民百姓流离失所，闻睹人食人事屡有发生，乃以拯救斯民为己任，而渴望逢遇辅佐英主。至于群雄谁是英主，混乱中实难以判断。

有平民出身的朱元璋，穷困之极而投身行伍，冲锋陷阵，攻城略地，表现得勇武英睿出众，颇引

起东南士绅瞩目。至正十三年（1353）六月，定远人李善长来谒朱元璋，并追随麾下，为之掌书记；及至正十五年（1355）六月，朱元璋自和州率众渡江，一举成功，拔太平路，当地耆儒陶安等赴辕门迎附，流寓于此的汪广洋也被征聘；至正十六年（1356）三月，朱元璋军队攻下集庆路，得儒士夏煜、孙炎、杨宪等，皆一一录用而委以军政事务；至正十七年（1357）七月，朱元璋微服咨访朱升，获献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”三策，乃命朱升参预帷幄密议并召赴金陵；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十二月，明兵攻取婺州并改路为府，次年正月立宁越府郡学，聘叶仪、宋濂为五经师，戴良为学正，吴沉为训导；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三月，朱元璋遣使持币赴浙东，聘宋濂、刘基、叶琛、章溢至南京，极尽赞誉曰“我为天下屈四先生”^{〔2〕}卷一百二十八……就这样，从起兵至渡江，及渡江后南侵，朱元璋不仅一路取胜，而且与文士多有遇合。

因有众文臣的襄助，朱元璋亦改头换面：其南京临时政府，不再是武人政权，而能文武兼用，并已试行文治。故十数年间，他四出征抚，西平陈友谅，东灭张士诚，南靖闽广，北有中原，终于武功大定，实现天下混一。^{〔3〕}卷三十四这是重整山河、再造乾坤的伟业，诚让饱经磨难的读书人看到希望。不仅先进者庆幸得遇明主，而且后进者亦感欢欣鼓舞。他们对新朝大都心悦诚服，而对亡元却似无故国之思。其所悦服者，大略有二端：一者，近百年蒙古异族统治一旦解除，汉族士人就迎来了身心大解放；二者，建始之际百废俱兴、急需用人，广大士人可望入仕、一偿夙愿。而皇明王朝要开国兴治，也确实提供了广阔舞台。

要在这广阔舞台上编排好各种角色，就必须吸纳接引各方能文饱学之士；而朱元璋正求治心切，也乐于打开仕进之门。仕进之门一旦打开，各方文士应征而起，络绎奔赴南京，接受新朝洗礼。首先是淮西、宣徽、金陵、浙东等新附地文人，在李善长、陶安、夏煜、宋濂诸先进的带动下，满怀理想与期待，陆续归附到明廷；之后是吴中、江右、闽中、岭南等内附地文人，在各路将领及随行文官的寻访礼聘催促护送下，怀着惊喜与疑惧，先后汇聚于南京。这是成规模的群落归附，每当大明军队攻占一地，当地文士即被搜罗殆尽，并按计划分批遣送京城。以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和猜忌成性，他希望天下读书人尽归朝廷所用，而不许遗逸在草野间，更不许将官私自留用。故而，

不仅老师硕儒被以礼征聘,即便名一艺者也尽行罗致。

其归附形式,大约有数端:(1)投附见驾;(2)躬往咨访;(3)遣使礼聘;(4)将官遣送;(5)胁迫诱逼。从时序上看,前两种归附形式发生最早,盖因朱元璋起兵扩张之初,常亲率大军披挂出征,有机会倾接各地文士,而当时急需智谋之士,故亟愿隆礼虚心纳谏。如李善长、陶安之来归,就属于投附见驾之形式;而朱升之欣然来附,则由人主躬往咨访。从成立南京临时政权到建立明朝前后,朱元璋为了吸引各地文人愿委身于他,多采用遣使礼聘形式,以感召高标自持之士。盖此时业已壮大,朱元璋坐镇金陵,较少外出亲征,无由倾接多士,而临时政权初成规模,正可虚位以待来附者。故吴元年(1367)十月甲辰日,朱元璋遣吴琳、魏观以币求贤;又于洪武元年(1368)十一月己亥日,遣文原吉、詹同、魏观、吴辅、赵寿,分行天下,访求贤才。^[3]卷三十六上及至开国之初,制作典章文物,诸如两修元史、纂礼乐书等,其所需职事人员多以礼聘至,像吴中名士高启、杨维桢入明,就出于这种特殊的机缘与恩遇。

如果说,前三种归附形式专适用于名士,则将官遣送多施用于一般士类,且多集中在较晚来附的文学群落,如江右、闽中、岭南、北方等地。特别是对北方士类,多能假以宽容优待。盖北方文士多得皇元恩惠,不少人甚至还有仕元经历,其南来归附明廷,难免多一重顾虑。针对北土的这一心结,朱元璋有更大包容度,一方面能够以礼对待愿仕者,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尊重静退者。如洪武元年三月,“大将军徐达既下山东,命所在州郡访取贤材,及尝仕宦居闲者,举赴京师。有司询求严迫,凡尝仕元者多疑惧不安,由是所在惊扰”;朱元璋闻之,“乃命中书省给榜,安谕所征人材,有不愿行者,有司不许驱迫,听其自便。其自他郡县避兵流寓、愿归乡者,听之”^[3]卷三十一。由此,北方士类便各得其所,静退者得以还归乡里,愿仕者亦能真心归附,不至有强烈故国之思。

但是,朱元璋对南北文士,亦非一味宽仁包容。相对而言,他对北方文士稍示宽厚,而对南方文士更显严厉;建国前他对文士更能优礼,而建国后对文士多有侮慢。因而,从征聘文士总态势看,他通常是恩威并施的,甚至对不与合作者,不惜采取胁迫诱逼。如洪武元年四月某日,大将军徐达兵至济宁;前元祭酒孔克坚称疾,遣其子

希学见于军门;徐达即遣送希学赴京,奏言其父病不能成行;但朱元璋不相信,乃以敕往谕之曰:“闻尔抱风疾,果然否?若无疾而称疾,则不可谕至恩之会。”而此时克坚亦自来朝,行至淮安途中遇敕使,乃拜命惶恐,更兼程而进。^[3]卷三十一在群雄中,朱元璋向以尊崇孔子礼遇儒臣著称,其对孔子后裔兼前元祭酒尚且如此,则对一般士类之迁延畏避者,当更加严程催促而不留余地。

经由这样恩威并施,各地文人招揽殆尽,即使不足以标榜野无遗贤,却也真正实现了群落归附。他们奔赴京师,济济会聚朝堂,既要接受新朝的洗礼,又要经受皇权的检验,适者生存,优胜劣汰。像陈谟那样命驾还山,虽受折腾而落寞失意;但得以寿考善终,实属不幸之万幸。其他来归而获任用者,在感受皇家恩典之时,都要遭遇猜忌,备尝忧危疑惧。他们或者被放外任,或者被留朝中侍御。外任的,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,工作环境也极为险恶。兵燹劫余之后,社会经济崩溃,社会秩序破坏,风俗教化沦丧,原来避居乡里的文士,满怀欢喜地进入新朝,还未充分感受皇恩浩荡,就被抛掷荒芜凄凉之境。如洪武六年(1373)六月,刘崧被调任北平按察副使。北平乃战后敝败苦寒之地,那是贵幸之臣不愿去往的;好在刘崧“量实揣分”,能欣然赴任并全节而还。^[7]卷四又如洪武三至六年(1370—1373)间,王祯因得罪相胡惟庸,在修完《元史》不久,就被莫名地排挤出朝,前往西北招谕吐蕃,后又转道出使云南,前往招降梁王,后竟不屈死节。在朝的,虽生活条件或许好些,但工作环境更为恶劣。他们除了竭忠竭诚参与朱元璋的文学侍御,还要不时遭受这位草莽皇帝的猜忌和戏弄。当皇帝龙颜愉悦时,他们或能得主隆恩;而皇帝常会无端震怒,每当震怒就大降刑祸。所以,人主的恩典越隆,侍臣的畏惧愈深。

更有一层,各地文人以群落归附明廷,也带来臣属间的协作问题。在朱元璋夺取天下进程中,先后来附文士的功绩不同,加上各地域的儒学自成传统,且众人的精神气质亦有差异;因而,他们在新朝的地位不同,所掌管的职事也有差别。大抵说,淮西文人如李善长等擅长吏治,主要掌管相权及政府要害部门;宣徽文人如朱升等通帝王之学,主要参与密议并规划国家体制;浙东文人如宋濂等得理学正传,主要执掌教化和主持典章制作;吴中文人因尝依附张士诚政权,败亡后

以张士诚部属遣送临濠,虽然洪武二年被放还,并陆续得到新朝起用,有的聘修《元史》《礼书》,有的参与文学侍御和行政事务,但他们入朝为官,总有一种负罪感,难获足够的信任,故无由委以重任;江右、闽中、岭南文人入明较晚,与朱元璋之逢遇亦无特殊的机缘,所以在明初政治舞台上,他们往往居于次要地位,甚或装点陪衬,仅供备数而已。他们齐聚朝堂,就会发生互动。这种群落间的互动,有时可能是友好的,但更多的是摩擦冲突,终至耗损而彼此消长。

大抵说,淮西与宣徽文人最早来附,当初深得朱元璋倚任信赖,且两地文人各有分工,彼此协作得较为友好;浙东文人之归附朱元璋,首膺朱升“王佐”之荐,后又得李善长大力推举,才获得“四先生”之誉。^{[2]卷一百二十八}是可以说,浙东文人与宣徽、淮西文人之交际,一开始是开诚布公的并且是友好的。浙西文人迁移入吴者,如杨维桢、陈基之流,或有浙东的生活经历,或有浙东的学术渊源,因而与浙东文人同源,其思行有天然亲近感。正是出于这个因缘,吴中文人入明之后,多愿与浙东文人同朝共事且相互修好,参与宋濂领导的典章制作和文学侍御。岭南文人因黄哲早前交接李善长,因而入明后多获淮西重臣的护持;江右文人以道德与诗学双修,赢得了文臣之首宋濂的青睐,前者倾心追捧后者,后者亦能赏拔前者。闽中文士入明最晚,其退隐归居又最早,来去匆匆是为过客,似无参预朝堂恩怨。

以上是友好的一面,但好景终难以长久;而摩擦冲突、耗损消长一面,则可谓险象环生、惊心动魄。淮西文臣掌握朝中重权,深受人主朱元璋的倚赖;但也因事权过重,反招朱元璋猜忌;又与浙东文人不和,以致相互攻讦陷害。朱元璋则非但不予调停,反而蓄意安排两边利用,以使两地文臣相互制衡,减弱对皇权的侵蚀约束。朱元璋尝拟任刘基为丞相,虽因刘基固辞而未付实施;然其意欲借刘基之名,以撼在任丞相李善长。洪武六年九月,又欲命宋濂参中书大政,也是出于同一政治意图。尽管浙东文士无意于出任丞相之职,却也不希望淮西文人集团独揽相权。及至李善长罢相后,朱元璋论相之人选,提出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三人,刘基以相才相器论之而都予否定。^{[2]卷一百二十八}后来,此三人竟都先后拜相,则刘基不为权奸所容,乃情势之必然,而非出自命数。淮西、浙东文臣宠遇之隆,使他地来附文臣莫可比

肩;而其最终结局之悲惨酷烈,更是让入明文士触目惊心。所以,高启称朝堂是“轧敝排狠之场”,而朱升致休时虑其子将死无完躯。^{[8]卷四[9]卷九}这种政治生态环境,虽说是各地文臣难以谐和的表现,又何尝不是出自朱元璋亲手导演?朱元璋不仅策动各方来附文臣争斗,而且对同出地的文人也要评论优劣,以挑起争心,使自相耗损。比如,他既推重宋濂,以为文臣之首;却又贬之为“文人耳”,称不如江南大儒桂彦良。^{[2]卷一百三十七}

追想明开国征聘之初,各地文人呈群落归附,并在多方互动中,显示出群体优势;但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,这种群体优势反成劣势。朝政风云凶险多变,人人深感自危不安,彼此难有自由坦诚的交流,群体互动便归于沉寂死灭。因此,当初以群落归附的各地文人,后来也以种种方式群体消灭:放外任的,流转多地,凄凄惶惶,永无归期,当年故地的诗酒酬唱,竟成物是人非之记忆;在朝堂的,局促压抑,致身无路,安生不得,或以过失罚作劳役,或以狱案不得其死;获休致的,功成身退,赏赐愈重,忧患愈深,虽出朝堂樊笼之外,仍在皇权罗网之中……此残害生命、禁锢身心还在其次,更严酷的是剪灭文士的理想意趣。当年,李善长投注草莽英雄朱元璋,愿以身家性命及富贵相寄托;日后,确实位极人臣、发福变泰,但转瞬间一切又化为乌有。当初,宋濂等选择雄猜之主朱元璋,是希望将他辅导成英主明君;后来,果然帮朱元璋坐上了皇位,自己却因约束皇权而被弃。要知道,当元末乱世民不聊生之际,各地文人所以能集聚成群,以诗酒酬唱兼讲习书礼,靠的就是这点理想意趣;当明初征聘广开仕途之时,各方文士大都愿奔赴新朝,虽满腹犹疑而义无反顾,凭的也是这点理想意趣。可如今,这点理想意趣被残酷政争剪灭了,各地文人的群体意识就无所附丽;而没有共同的群体意识,文学群落也就自行消歇。

三、东南各地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

由上可知,元末明初东南各地文学群落,实成为当代文学的主体构造;而呈地域群落分布的东南文坛格局及其变动,又构成元明易代大转变时期文学活动的主线。这是一种罕见而特异的文学形态,与盛国时期的常规文学形态不同,其主导方面不在中央庙堂,而在政化不通的地方文苑。也就是说,从故元皇纲解纽、庙堂文学顿衰,到

新朝秩序初建、文学侍御方兴,期间曾有一度文柄失坠,中央庙堂丧失话语权力,因使地方文苑多元并起,呈现地域文学的大繁荣。这种庙堂与地方文学之互动,体现了中国文学自身的规制:中央庙堂文学一旦衰落,就会让出自由滋长空间,促进地方文学快速生长;且地方文学之生长,又会不断积蓄能量,源源灌注中央庙堂;而中央庙堂文学之复兴,又引导地方文学的走向,迫使地方文学日渐消歇。

此一易代之际特有的现象,值得研治中国文学者重视。至于如何探研这种现象,似应从其层级构造着眼;而要还原其层级构造,又需有效的研究策略。

(一)整体把握

东南各地文学群落兴衰,是同源共生互动的产物;且在入明之后殊途同归,呈现多元并存之整体性。说它们同源,是因为东南各地文学的精神,大都与宋以来儒学派系接脉:宣徽文学之于新安儒学,西昌文学之于清江儒学;金华文学之于朱子学正宗,又之于吕氏中原文献之学;浙东南部文学之于温处事功之学,浙东东部文学之于甬上陆氏心学;浙西文学既发扬吴中本土之才藻,又吸纳浙东文士携来的精神气质;闽中诗学嗣法严羽宗法盛唐、以禅喻诗,实际上是远绍陆氏心学援禅说儒之绪论;淮西处南北要冲四战之地,其文学精神混杂不名所主,岭南处山海之间荒僻之区,其文学精神多得江山之助……然寻源溯流、总其归途,大抵不出宋元儒学范围。由此可知,当年程颢目送杨时预言“吾道南矣”^{〔10〕}卷四百二十八,实已肇开元末东南各地文学兴起之源。说他们共生,是因为东南各地的文人士子,生长于共同的社会文化环境:一方面,都遭遇蒙元异族统治的压抑,因仕进无门而滋生疏离意绪;另一方面,都饱受元末群雄割据之侵扰,因身家难保而抱持种种心态。处此苍天一色的大环境,广大文士尽管属地不同,出处安危、荣辱否泰各有差异,但生活旨趣和人生选择却趋同。不论是窜伏山林,还是委曲事人;不论是清真自守,还是择主而事,他们都乐于诗酒交欢,追求短暂的人生适意,或兼讲习书礼,坚守士之志业。由此可知,东南文士虽人各一体,却存寓地域群落之中;文学群落虽各在一方,却共处东南聚落之中;文人聚落虽偏居东南,却汇入天下大势之中。说他们互动,是因为各地文人虽独立成群,却会在一定条件下磨合

协作:尽管受到地缘影响,各地儒学传承不同,群体精神气质有异,文学趣味风尚多样,但这些差异是多元并存的,未臻矛盾对立以至水火不容,更未因割据政权影响,而产生政治上的分立。所以,伏居山中的宣徽宿儒朱升,愿意力荐浙东处州之三贤,而权势煊赫的淮西李善长,亦能推举未来的政敌刘基。依附张士诚的陈基、杨维桢,能与乡邦故旧保持友好交往,而宋濂、戴良以同学兼好友,却分事朱元璋、张士诚政权。避居岭海间的黄哲游走金陵,老早就被李善长招揽至麾下,而当初权位偏低的江右文人,获宋濂辈接引而后声名日隆。及至入明之后齐聚朝堂,或相互友善以共期美好,或彼此倾轧而互不相让,却都荣辱损益相因相生。比如,江右、浙东分属两个文化区域,在入明之前两地文人并无交往,入明之后前者服膺后者提携,共同敷饰皇明开国文治景象。在入明众文人群体之中,此两处文人合作最友好,但这种友好的深层隐含竞争,结果导致两个群落此消彼涨,浙东文人逐渐退出终至消失,江右文人取而代之入主馆阁。又如,淮西、浙东文臣分掌行政教化,本来可以各安其事以同侍一主,但朱元璋诱使他们相互牵制,结果弄得势不两立先后俱亡。在入明众多文人群体之中,此两处文人争斗最为忌刻,但这种忌刻的背面犹藏宽忍,刘基决不与胡惟庸正面冲撞,而胡惟庸反将浙东文士拉拢,结果姑息养奸最终酿成大祸。

(二)动态描述

东南各地域文学有自身的规定性,动态地呈现为定势之中有通变。首先从各地域文学的定势来看,其生态环境和艺术特质较恒定,既不因人为选择而转移,也不为外来强力所喧夺。特定的山川地理、自然风物,长养着世代聚居于此的人民,尤其是晚唐五代以来入迁的故家旧族,经历了几百年的生聚繁衍、婚育教养,逐渐成为当地社会族群的核心,将携来文化与土著气习相糅合,而形成颇具地域特性的文化基质,提供儒学教化和文学活动的土壤。比如江右的西昌文学,作为一个次文学群落,其雅正平和文学风范之确立,除了受益于独厚的江山之助,还得力于南唐故家之核聚作用,以及接脉清真自守的清江儒学。清江儒学创始于清江刘靖之、刘清之兄弟,由其高弟在南宋孝宁年间至此讲习弘传,及至元末明初近二百年来,其精神裔脉一直在西昌传承。南唐故家为五代末金陵七姓庶族,为躲避南唐王朝覆

亡而迁居西昌,他们很快就融入迁徙地,与当地世居民和谐相处,互通婚姻,递相师友,历四百余年的生息长养发展,而成为当地文化精神之主体,至于山川构造、风土人情,则为西昌亘古以来所固有,其与当地居民的自然关系,早已同化为文化心理结构。^[11]正是受此类要素的规定,西昌文学才具有稳定性,其雅正平和的特质,能够一直绵延不绝。他地的文学风范,亦由此可见一斑。但是从各地域文学的通变来看,除了保持其文学特质相对恒定外,各地域文学又要适时应变,否则会因缺乏机变而消亡。虽然地域文学特质一旦形成,就因其先天赋予而具稳定性,既难以移易也不被喧夺,不至于发生毁灭性的质变,但可以超越质变,在别的层面变动。比如,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量变,使地域特质强化或者弱化。所谓强化,就是让地域特质增重扩展,以至超出地域文学的界限,成为领导主流文学的风尚;所谓弱化,就是让地域特色减轻退缩,以至脱离主流文学的裹挟,回归原地而消融于大化中。前者如西昌雅正文学通往馆阁,成为明初笼盖朝野的文学思潮;后者如吴中绮丽文风淡出翰苑,并随文学主体老死而一蹶不振。然而,不论强化抑或弱化,都应是动态循环的。地域特质被强化之极限,就将这种特质消耗殆尽,最终要回归原地,而消融于大化中;地域特质被弱化之极限,就会激发它的原初生机,最终会重新增长,而凝定地域特质。明初馆阁文学大肆流行之后,终因缺乏生命力而萎靡不振;明初吴中文学长期消歇过后,终至明代中期悄然复兴崛起。其所展示的双向消长进程,恰蕴涵这种动态循环之机。再如,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场变,使地域文学经受选择淘汰。元末群雄割据时期,在相对独立的环境里,各地文学是自生、自足而自适的,能满足一方士民的风雅俚俗需求,而各方文士一旦应聘入朝,便将习得的文风一同携来,在以文学侍御的竞技场,竭力演饰皇明开国气象。但因学养才调好尚不同,各地域文人的表现有异:有些人温厚持正,如浙东宋濂之辈,俨然以帝王师自居,最终不为皇权所容;有些人绮丽哀怨,如吴中高启之流,发抒怨怼不平之鸣,自我放逐终貽其咎;有些人磊落狂斐,如岭南孙蕡之徒,沐猴而冠误入棘丛,惹怨招祸不得其死;有些人似无一能,如闽中林鸿之类,远身事外自免还乡,低吟浅唱终老林泉;有些人随遇而安,如江右刘崧之俦,居不择地仕

不择官,委蛇廉慎葆有后劲……就这样,各方文人试图尽己所能,来迎合明初政治的需要,但难以适应皇权,大都遭受打击排抑。这种结局是双方始料未及的,而推其原由乃在于场变所致。若各方文士能够克除故态旧习,并在出仕新朝后能够各安其职,则可适应从地方到庙堂之场变;而实际情况是故态旧习难改变,且共事一堂又容易出位越职,因而不适从地方到庙堂之场变。适应者将得到助长,不适者将逐渐消亡,入明各文人群遭遇此境,必引发地域文学之场变。

(三) 焦点透视

通观东南各地文学群落性状,除了前述的整体性和规定性外,还有不容忽视的复杂性,以及由此引发的艰巨性。要深切此复杂艰巨的研究对象,就需稳当处理几个层级的关系:(1)文学群体与文人个体的关系。文学群体是由文人个体构成的,而文人个体又附丽在群体之上。因此,不能只罗列若干作家专论,来代替对文学群体的描述;也不能用文学群体的观念,来消泯对文人个体的关注。比如,宣徽文士见诸文献载录者,著名的有陶安、朱升等人。他们出处行思及文学活动常被个人化,而其同源共生的群体属性却易被忽视。反之,闽中、岭南文人因入明后名位不振,其个体存在往往消失在群体印象中。(2)文学群落与文人圈次的关系。文学群落是文人集群的生态聚合,在一些文化内涵较深广的地域里,文学群落之构成除了文人个体,还有两种更高层位的文人集群:一是由若干文人个体组成的圈属;二是由个体或圈属组合的次群落。这种圈次介于群体与个体之间,是最原初形态的文人集群单元,而多圈次的生态聚合,就形成地域文学群落。就一般情形而言,文人圈次遍存于东南各地文学群落中,如江右文学群落就包含多个文人圈次:在南昌,有朱氏父子熊胡师徒、李周旷辛万郑诸才子等志趣型圈次;在临江,有金梁刘胡张聂“六贤”、裴彭杨“三凤”等尚友型圈次;在泰和,有杨罗邓、西昌十名贤及二妙、三杰、三贤等族群型圈次。^[12]多个文人圈次并存于某地,是出于原生态的自由滋长。其成员可以有交叉重叠,如泰和族群型文人圈次;也可能各自相对独立的,如临江尚友型文人圈次;或者平日很少发生交往,如南昌志趣型文人圈次。(3)文学群落与次群落的关系。既然文学群落包含多个次群落,那就会构成集合与种属之关系。地域群落是母集合,诸次

群落是子集合,即前者是属,而后者是种。但各次群落地位并非一概平等,而往往会以某个次群落为核心,来带动其他的次群落,从而核聚成地域群落。比如浙东文学群落之构形,就是以金华次群落为核心,引领处睦甬越等次群落文人,以协作、旁观、抑扬或呼应,因使浙东文士整体上声气相应,又使诸次群落表现出和而不同。(4)文学群落与泛群落的关系。文学群落产生自某个区域,应有特定的地域文化属性。当元末避居一隅时,他们是自生自足的,而一旦以地域群落归附明廷,就与他地文学群落齐聚朝堂,彼此之间进行互动,形成新的文学生态。然在皇权政治高压打抑下,这种生态未能朝良性发展,而是日益乖戾趋于恶化,终至摩擦争斗不容协作。在这极端恶劣的文学生态中,文人好意气相使而自我标榜,就自然会宣扬早前的文学群落,以强化该群落的地域身份认同。于是,有所谓浙东四先生、江西十才子、南园五先生,以及北郭十友、吴中四杰、闽中十子竞相名世,显身现影而并辔齐驱,纷纷争鸣于朝堂之上。它们是入明后的文学群体称谓,却用来指称入明前的地域群落,且所指除了原有的圈次个体外,还新增未尝预事的圈次个体。这样,就会出现一种泛群落现象,以与原地域群落重叠错位。(5)泛群落与领衔作家的关系。泛文学群落之能够并列朝堂,往往得力于领衔作

家的推动。这也可以反过来说,某个泛文学群落之鸣世,必将推出它的领衔作家。比如,刘崧应聘入明之后,以诗歌获宋濂推重,而成为江西各府县文人表率,引领江右文学汇入皇明大雅,标举颇具地域特性的西江派,以与同朝他地文学并驱较胜。其他与此类似者,恰如胡应麟所云:“国初,吴诗派昉高季迪,越诗派昉刘伯温,闽诗派昉林子羽,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,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。五家才力,咸足以雄据一方,先驱当代。”^[13]卷一

鉴于上述三个层面的考察,探研东南各地文学群落:先要基于它的整体性,来对之作出整体把握;次应立足它的规定性,来对之进行动态描述;还须照应它的复杂性,来对之实施焦点透视。这样才可望在特定时空维度中,还原地方文学群落的层级构造。其基本构造,可略描述为:元末扰乱,群雄割据,有若干文士在特定的环境里,聚合成相对独立的文学圈次;并在深广的文化区域范围内,自由滋长出多个次文学群落;又从中突出一个核心次群落,且在该核心次群落的带动下,形成更高级位的地域文学群落,从而将各次文学群落容纳其中;及至应聘到明廷之后,各地文人以群落归附,齐聚朝堂,并驱较胜,进而扩展成泛文学群落,同时争相推出领衔作家,以标举各方的地域特性,共同敷饰皇明开国气象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宋濂,等.元史[M]//二十四史:缩印本.北京:中华书局,1997.
- [2] 张廷玉,等.明史[M]//二十四史:缩印本.北京:中华书局,1997.
- [3] 胡广,等.明太祖实录[M]//明实录.台北: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1962.
- [4] 杨士奇.东里文集[M].刘伯涵,朱海,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98.
- [5] 钱谦益.国初群雄事略[M].张德信,韩志远,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- [6] 朱元璋.明太祖文集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3.
- [7] 刘崧.槎翁文集[M]//四库存目丛书.济南:齐鲁书社,1996.
- [8] 高启.凫藻集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3.
- [9] 朱升.朱枫林集[M]//安徽古籍丛书.刘尚恒,校注.合肥:黄山书社,1992.
- [10] 脱脱,等.宋史[M]//二十四史:缩印本.北京:中华书局,1997.
- [11] 饶龙隼.南唐故家与西昌文学[J].文学评论,2005,(4).
- [12] 江立员,饶龙隼.江西十才子论考[J].江西师范大学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,2012,(1).
- [13] 胡应麟.诗薮·续编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.

[责任编辑:欣杰]